

基于原始陶纹印记抑埴现象 脞徵史前陶作与玺印生发的关联

郭清华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原始陶器图纹印记及玺印考古实证材料的搜集，用来比较、考证完整意义上的玺印出现之前的史前陶作与玺印生发的关联。文中阐明，从公元前18000—公元前17000年间万年仙人洞遗存原始陶片的抑埴图纹、印记来看，自史前人类陶作的发轫，便孕育了玺印的萌芽，并以其自身固有的历史演进程序而自成体系。如若认可史前陶器（片）抑埴图纹印记乃玺印原生态的表现形式，那么，印史可上溯到万年仙人洞人类早期制陶活动时期。换言之，玺印的出现并非某一地区、部族的专属，当一个集群部落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都能以各自独立的方式发明、创造出来；它是人类长期生产、生活实践的必然结果，并且在其生发演进过程中，依自身需求而加以吸收、融合、改进和完善。以社会发展学的理念审视，原始陶器图纹印记的抑埴行为现象，必然直接导致玺印生发。

关键词：原始 陶器 图纹 印记 抑埴

图纹、印记作为人类早期文明活动的凭信标识和薪火相传的重要载体，有着伴随文明生发的历史。尽管所处地域生态与文化关系不尽相同，但在承载本民族文化基因的同时，共同存在着抑埴行为现象的普遍性。

图纹、印记抑埴现象作为制陶手段和玺印生发的基元，从文字学角度检点，多有反映。如“印”字最早见于殷墟甲骨文^[1]，《古籀汇编》释曰：“《说文解字》，𠩺，按也，从反；印俗从手作抑，又印注，执政所持信也，从爪卩。卜辞‘𠩺’字从爪，从人跂，象手抑人而使之跂。其谊如许书之抑，其字形则如许书之印。”^[2]故凡印之属皆存此意。从古音韵学探赜，单音词时代的“印”叫做“印”或“玺”，本意都作动词之解，缘于两者古音相近，韵部相同，后同转化为名词，故共引之为印章之称。

“抑埴”一词，初见于《淮南子·齐俗》：“若玺之抑埴，正与之正，倾与之倾。”^[3]所谓抑，即“𠩺”，按也，从反印，子棘切；抑俗从手”^[4]，故存“按”意。换言之，“抑”之本字实

[1] 刘钊等：《新甲骨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2—513页。

[2] 徐文镜：《古籀汇编》第九上，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5页。

[3] 《辞源》一，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0610页。

[4]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7页上。

为“印”字。埴，即“黏土也，从土直声”^[1]。又《书·禹贡》：“厥土赤埴埴。”《管子·君臣上》：“如冶之于金，陶之于埴，制在工也。”《庄子·马蹄》：“陶者曰：我善治埴。”^[2]如此等等，皆与黏土和制陶之泥有关。李学勤先生在诠释于省吾《双剑谿古器物图录》著录的商代三玺之一“田字格”四字玺（图1）时，将其解读为“刂旬抑直”（图2），并有“玺文云‘抑埴’，只能理解为钤印封泥或近似的行为，例如用以钤印陶器，同于后世玺印”^[3]之说。这是关于“抑埴”一词具有玺印功用与按压行为的唯一实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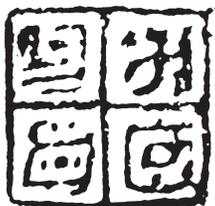


图1 商代田格四字“刂旬抑直”玺
2.8厘米×2.0厘米



图2 李学勤释“刂旬抑直”玺文

基于原始陶器图纹印记抑埴现象视角的分析，从考古学意义征考，玺印抑埴行为之源可上溯到中石器时代（公元前18000—公元前17000年）以前人类早期的制陶活动时期。傅嘉仪先生在《印的起源》一文中指出：

中国印章的发展史，就是不断创造的改革史，从制陶压捺手法，纹饰制作，泥封和使用，都与制陶的工艺息息相关。随着考古文物事业的发展，玺印文化的深入研究，关于中国印章起源的探讨将会日渐明确。^[4]

傅氏之论源于叶伟夫先生“就印章的戳压和再现其内容的这一形式来说，陶拍是印章的雏形”^[5]观点的认可与上溯。于此，学人多有备述，更有业界专家、学者的精研深论难以逾越。早在20世纪50年代，林惠祥先生便把福建河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拍式抑埴工具称为“乌石峒陶印”^[6]。从现有资料看，玺印缘于早期制陶抑埴工具陶拍、陶戳演化的观点已趋于业界认同；但对于“以社会发展学理念审视，原始陶器图纹印记的抑埴行为现象，必然直接导致玺印生发”的观点，直陈论断者鲜矣。

[1] 许慎：《说文解字》，第286页下。

[2] 《辞源》一，第0610页。

[3] 李学勤：《试说传出殷墟的田字格玺》，《中国书法》2001年第12期，第8—9页。

[4] 傅嘉仪：《印的起源》，《全国首届“篆刻学”暨篆刻发展战略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书画报社、西泠印社1997年版，第1—35页。

[5] 叶伟夫：《中国印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6] 林惠祥：《福建省长汀县河田新石器时代遗址》，《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1957年第1期。

一、抑埴图纹印记承受客体之史前子遗

陶器作为抑埴图纹印记的承受客体之一，它的发明，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恩格斯指出：“人类从野蛮低级阶段向文明阶段的发展，是以学会制陶术开始的。”^[1]考古发现证明，我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制用陶器的地区之一，中华先民早在距今万年之前，便已经开始了以黏土经高温烧结方式的制陶行为。与此同时，缘于抑埴现象的出现，致使图纹印记也开始用于抑埴陶器之上。这种行为的出现，可以说是直接导致玺印生发的“生命之源”。从社会发展学观点分析，如若认可抑埴于原始古陶器的图纹印记为玺印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实也正是这个简单现象的出现，直接导致了玺印的生发；那么，玺印的发展史则可上溯到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10000—公元前7000年）之前。

大量的考古实践证实，原始陶器上图纹印记抑埴现象的出现，缘于加固胎壁，以防止和弥补泥坯在晾晒、烧制过程中因收缩而造成变形、开裂、破碎现象的发生，而美化、装饰器物的功用则次之。依据这个观点分析，伴随着陶器图纹印记的出现，其抑埴工具（如陶拍、戳、模）也应随之出现；但由于各类因素与缘故，致使所能见到的抑埴工具实物极其少见。相反的是，经多年考古发掘，带有抑埴图纹印记的原始陶器或残片实例，却有大量的遗存发现可考。

（一）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洞穴遗址的图纹、印记陶片遗存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考古界先后对江西万年县仙人洞与吊桶环两处史前人类栖息洞穴遗址进行了五次大规模发掘，出土了大量夹粗砂厚胎陶器残片与栽培稻植硅石。据测定数据显示，仙人洞最早的人类活动时间大致在距今20000—15000年之间^[2]。

2009年，北大、哈佛、波士顿三大名校联合对仙人洞陶器年代作进一步研究，重新清理考古地层剖面并采集系列样品。对陶片和¹⁴C测年样品层位关系开展地层显微结构分析，结果显示：所测定的地层样品数据代表了同层位陶器的年代。最终证实遗址所出陶片距今20000—19000年，比东亚和其他地区陶器早2000—3000年。洞穴内的遗存证明这些陶器是在末次冰盛期由采集狩猎者所制造的，可能被用做炊煮器。说明陶器在农业出现以前一万年，甚至更早就被制造和使用了。^[3]仙人洞遗存陶器作为目前世界上已发现成型陶器的最早年代已成定论，并被评选为美国《考古》杂志2012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其中夹粗砂的抑埴凹点图纹陶片（图3）^[4]、抑埴绳纹及刻划纹陶片（图4）^[5]，除作为考古学编年与陶器起源研究的珍贵资料，更是研究印学史的原始学术支持。

[1] 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 刘诗中：《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发掘获重要进展》，《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28日，第4期。

[3] 吴小红、张弛、保罗·格德伯格、大卫·科恩、潘岩、蒂娜·阿平、欧弗·巴尔-约瑟夫：《江西仙人洞遗址两万年前陶器的年代研究》，《南方文物》2012年第3期；Xiaohong Wu, Chi Zhang, Paul Goldberg, David Cohen, Yan Pan, Trina Arpin, Ofer Bar-Yosef (2012). Early Pottery at 20, 000 Years Ago in Xianrendong Cave, China. Science, 336, 1696-1700.

[4] 杨雪、朱文新：《万年仙人洞出土最古老陶器入选2012年全球十大考古发现》，《上饶之窗》2012年12月24日。

[5] 陈艳伟：《世界最早陶器出自万年仙人洞》，《江南都市报》2012年7月27日。



图3 带有抑埴凹点印纹的夹粗砂厚胎陶罐残片



图4 带有抑埴印纹的夹粗砂厚胎陶罐残片

在发现的陶器（片）中，夹粗砂陶片的凹点系用圆头棍棒类工具抑埴而成，是人类原始的一种本能行为所致，就目前考古年代来说，称之为“抑埴祖纹”不为过，其意义也远不止于印学。其绳纹陶多系以缠绕或刻划绳纹的陶、木工具抑埴而成，最初目的就是为防止胎裂，次而渐有美化、装饰之用。除此，绳纹陶凹凸器表，于炊事火烧可有增加吸热量兼具减缓剧热、骤冷破坏作用，似这类原始图纹印记沿用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二）广西桂林象山甌皮岩遗址的图纹陶片

1965年发现的广西桂林象山甌皮岩遗址，史前遗存一至五期共发掘陶制品439件（另有未定名器45件）、夹砂陶片921片^[1]。第一期仅一件“双料混炼”^[2]技术制作的成型陶器，简称“甌皮岩首期陶”，定名“陶雏器”（图5）^[3]：器为断裂的两片陶器残片，烧结温度极低，胎质疏松，距今12000年。遗址第五期文化层的陶片更是出现了戳印、水波、曲折、刻划等多种纹饰，据相应蚌螺壳的测定数据，距今 11310 ± 180 年^[4]，上海博物馆的测定年代为距今 10370 ± 870 年到 9240 ± 620 年。该遗址陶片具有抑埴的绳纹印痕（图6）^[5]或有竹篮、竹席、网状、筛孔等编织纹。“这些编织纹应像绳纹那样是由制作陶器的工具留下的印痕”（图7：1—4）^[6]，均系先民们陶作的抑埴行为所形

[1]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桂林甌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考古》1976年第3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甌皮岩遗址博物馆、桂林市文物工作队：《桂林甌皮岩》，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2] 双料混炼：是指利用自然泥土与其他材料按比例施水羼和，经混练后，形成具有一定黏结力及抗烧炼能力的坯料，以其塑制的器物可承受一定程度的高温烧炼甚至可达炼而不裂的工艺。

[3] 陈向进、周海：《甌皮岩首期陶双料混炼工艺及陶雏器初探》，《江苏陶瓷》2016年第2期，第2页，图1。陶雏器：是指采用“双料混炼”工艺，通过一定方式成型，未经烧制即可承受一定程度火烧，在使用中经火烧形成一定致密度，而尚未完全陶化的夹砂泥塑器。

[4]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碳十四实验室等：《石灰岩地区碳14样品年代的可靠性与甌皮岩等遗址的年代问题》，《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5] 胡大鹏、漆招进、韦军：《广西桂林甌皮岩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陶器》，《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225页，图2：1—5。

[6] 胡大鹏、漆招进、韦军：《广西桂林甌皮岩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陶器》，《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第213—225页，图3：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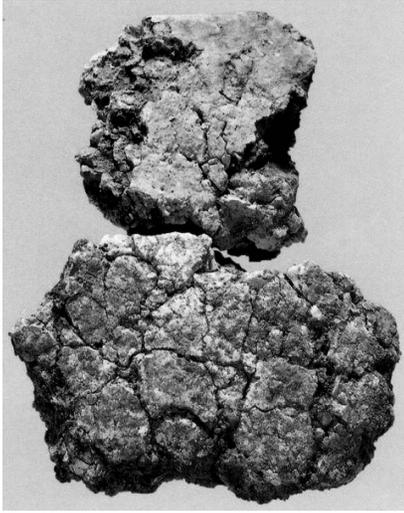


图5 甌皮岩首期陶“陶埴器”残片



图6 甌皮岩遗址带绳拍印痕纹的陶片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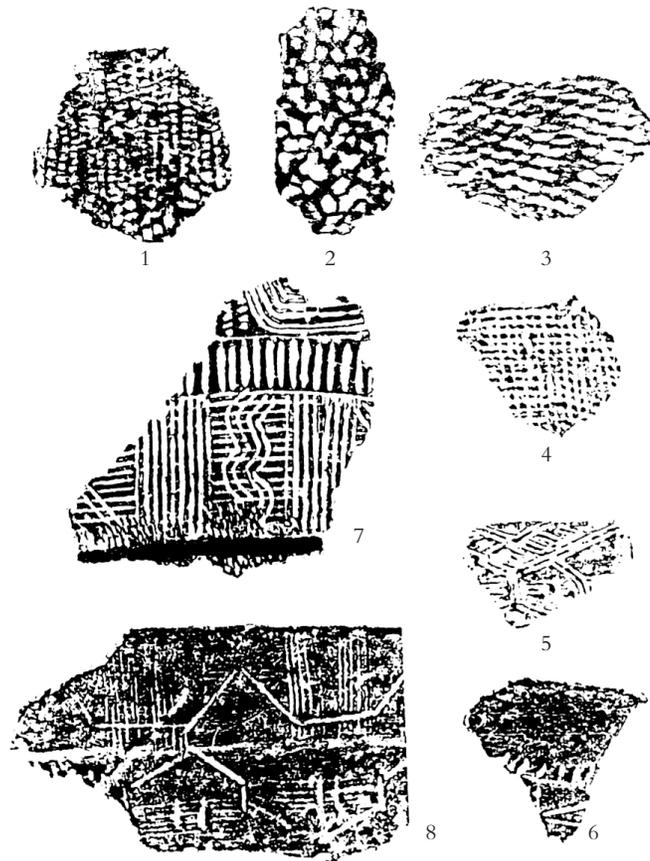


图7 甌皮岩遗址编织纹（1—4）、几何纹印痕的陶片（5—8）拓片

成，某些图纹印记已具备了纯粹意义上的几何现象（图7：5—8）。此外，桂林的庙岩、大岩遗址也有距今超过10000年以上类似抑埴图纹印记的陶器发现。

（三）其他遗存抑埴图纹印记的陶片发现

除万年仙人洞、吊桶环以及桂林甌皮岩经典遗址外，尚有多地史前人类遗址带有抑埴图纹印记的陶片遗存：

1. 广西南宁顶蛳山豹子头遗址曾出土过20多件完整陶器具^[1]，年代距今 10735 ± 200 至 9985 ± 200 年。其第一期出现的陶器图纹与仙人洞早期陶器特征相似，年代也大体一致，约在距今10000年。^[2]

2. 兴隆洼文化是首次发现于内蒙古敖汉旗的早期遗址，出土陶器以灰褐与黄褐色夹砂深筒直腹罐类为典型。其纹饰以抑埴的网格和“之”字纹为特征，兼有横人字、席状纹等，年代为距今8200—7400年。^[3]

3. 广西柳州大龙潭鲤鱼嘴遗址，下层存有8块陶片，测年要比此前发现的甌皮岩与豹子头石器更为原始，属旧石器时代。遗址二期出土陶器均为残片，以夹粗砂红褐陶为主，器表多抑埴粗绳纹或中绳纹。这些图纹印记与桂林甌皮岩第三期文化及南宁顶蛳山第二期文化的同类器物具有相似性，其年代大致在距今9000年前后。^[4]又如2003—2005年间，中美联合考古队对湖南道州寿雁镇玉蟾岩遗址出土的此类早期陶器进行了系统¹⁴C年代测定，确定为距今18000年。

如此等等，这些陶器的发现和年代的确定，为陶器抑埴图纹印记纹饰的追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抑埴图纹印记之经典造型客体

普遍认为，源于抑埴的启发，作为最早用于转印复制图纹印记的抑埴工具，到了新石器时期便逐渐演变成为专属于制陶的抑埴工具——陶拍与戳模。这种原始单一功用的抑埴形式，成为后来玺印萌发的胚芽。

（一）不同地域的拍式抑埴工具

陶拍作为制陶抑埴图纹印记的工具已为共识，陶、石、甲壳抑或木质均可为之。器形虽种类繁多、各具形态，然其图纹印记多为或阴或阳的几何形状，诸如圈、点、同心圆、窝纹、平行线、斜条、方格、菱形、斜线夹点、波浪、叶脉、蕉叶、席纹、回纹、云雷纹、夔纹等一应俱全，这些已被印学界视为图形玺印的初始。

[1]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等：《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75年第5期。

[2] 李淀：《南宁顶蛳山贝丘遗址》，《中国文化遗产》2008年第5期。

[3] 赵宾福：《兴隆洼文化的类型、分期与聚落结构研究》，《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1期；吕昕娱：《兴隆洼文化陶器初论》，《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科版）》2007年第2期。

[4] 张龙：《广西南宁市豹子头贝丘遗址的发掘报告》，《考古》2003年第10期；柳州市博物馆等：《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83年第9期。

1. 20世纪50年代初，林惠祥先生在福建长汀县河田镇乌石寨新石器时代遗址采集到新石器遗物1300余件，其中有20件为陶质拍式抑埴工具，他称其为“乌石寨陶印”（图8）^[1]，其形制多为简易方形，拍面也多为单一几何图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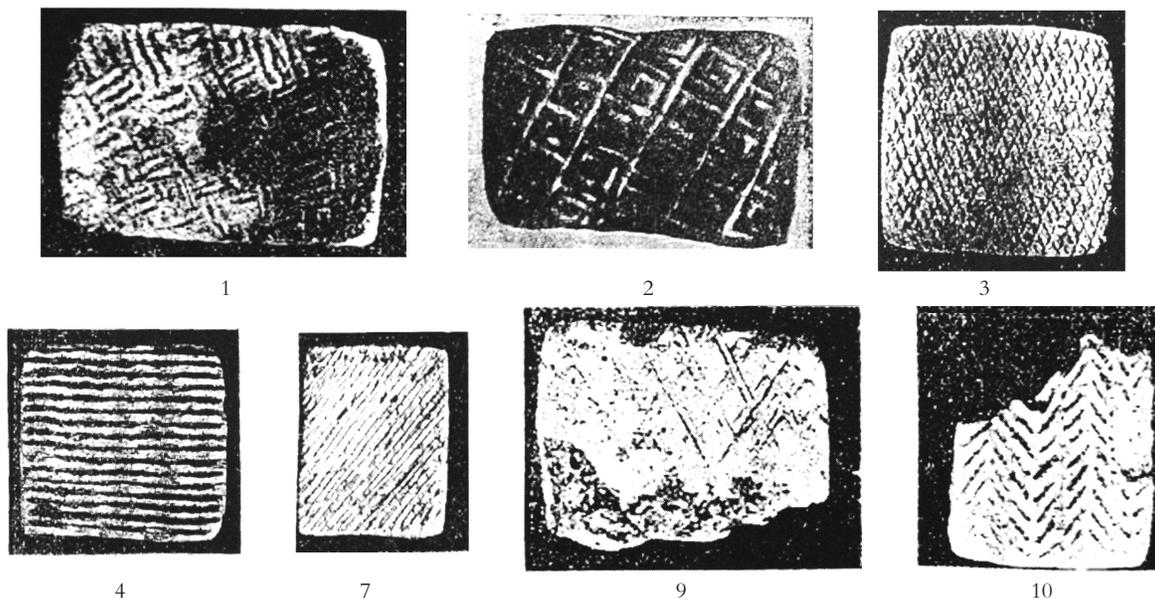


图8 几何纹“乌石寨陶印”

2. 1950年，浙江杭州老和山和黄家山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或遗物，“其中老和山遗址是进过发掘的，出有大量石器和陶片。”^[2]在老和山新石器时代末期遗址出土了两件形制不同的陶质拍式抑埴工具，虽属同出且皆具柄钮，然其体、面大相径庭：一为蘑菇形，弧形拍面有抑埴的凹陷坑点纹（图9左）^[3]；另一件为方形托泥板状，两面均带有帘席图纹（图9右）。这种经纬帘席图纹抑埴转印技术的应用，可从河姆渡遗址三、四文化层中出土的上百件苇席残片实物（图10）^[4]中得以印证。

3. 作为江淮地区新石器至殷商（公元前1556—公元前1046年）时期的安徽大城头遗址，位于肥东阚集乡大程村，出土有大量石器、成品陶器及陶片等标本。1957年，胡悦谦先生根据安徽十处遗址的发现提出：

淮河区的古代文化，含有很厚的龙山文化因素。在长江区的各遗址中出现硬质印纹陶，又

[1] 林惠祥：《福建省长汀县河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图71—75。

[2] 华东文物工作队：《四年来华东区的文物工作及其重要的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8期，第6页。

[3] 蒋缙初：《杭州老和山遗址1953年第一次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第13页，图版肆5、6，图版贰15。

[4] 仲星明：《中国古代印刷图形探源》，南京艺术学院学位论文，分类号：Y0301031，2006年5月，第3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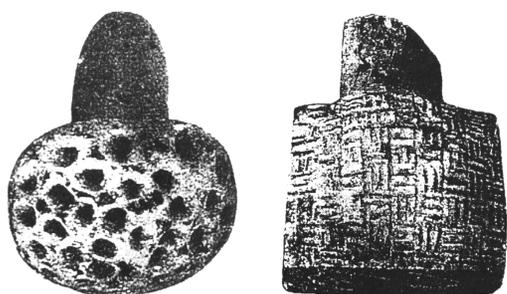


图9 蘑菇式与方形托泥板式陶印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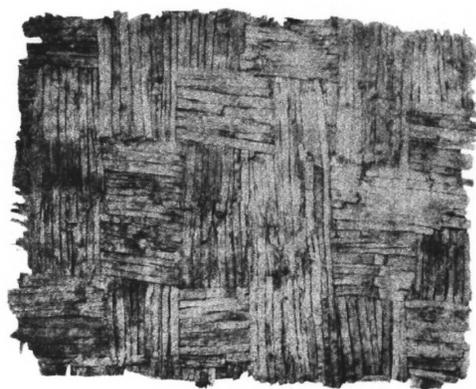


图10 原始编织物苇席残片（约1平方米）

具有江南区的特点。^[1]

虽说当年对新石器时代遗存有了一般了解，但对抑埴有图纹印记的硬质陶时代认识不明确。所出两件夹粗砂红陶质拍式抑埴工具：一件为椭圆形饼状，印面为线形不规则格纹（图11左）；另一件为等边钝三角形状，印面叶脉纹（图11右）^[2]。两器虽未准确测年，但鉴于两者的胎质，其年代不应晚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5000—公元前2500年）。随着肥东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不断发现，在证明江淮文明连续性的同时，也反映出了其陶质拍式抑埴工具出现的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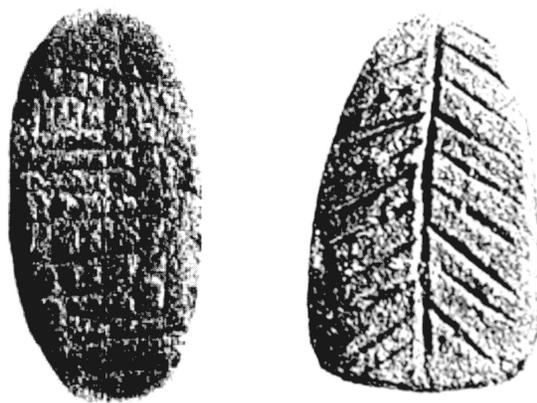


图11 几何、叶脉纹的两件陶印模

4. 发现于1957年的江苏徐州铜山高皇庙遗址，相当于盘庚迁殷（公元前1320年）前后时期。其第二层殷商文化层同时出土了长方或长三角形的多件陶质抑埴工具，其器面为蕨纹或人字纹饰，器体两端双翘呈半弧形，体背有绳纹环形握把，呈抹泥板状。其长方形者（图12左）貌似秦兵马俑

[1] 胡悦谦：《安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第27—36页。

[2] 林惠祥：《福建省长汀县河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图版一，10；图版三，5、7，第27页。

跪射俑所穿方头履底（图13）；长三角形者以45°角观察状似牛角（图12右）。^[1]这些抑埴工具看似另类，却“具备印文（印面）、印体（印台）、印钮（印柄）三要素”^[2]的基本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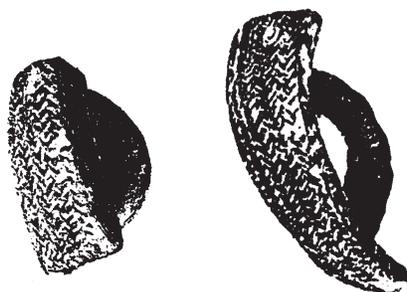


图12 高皇庙遗址陶拍



图13 秦兵马俑跪射俑右侧履底

5. 具有典型意义的商代（公元前1500—公元前1066年）夹砂红陶雷电击人图纹拍式抑埴工具（图14）^[3]，1961年出土于湖北汉阳。器呈椭圆形，有拍面与鼻梁握钮。其握钮面的下部有刻线人物图纹，人呈正面四肢伸展式，表情目瞪口呆状，手足皆三指；头顶正中刻箭矢，其箭杆线过墙连接拍面的两相方联雷闪纹。这类雷电击人瞬间状态的刻画，可谓简明精准，无论有否警示之意，此器所具备的“玺印意义”的抑埴“三要素”不容置疑。



图14 拍面刻有过墙雷纹与握梁鼻钮人形纹相连的椭圆形陶拍

[1] 谢春祝：《徐州高皇庙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第12页，图版陆4—7之一。

[2] 徐畅：《先秦玺印图说》，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徐畅：《安阳殷墟出土铜印——兼谈玺印的起源》，《篆刻》杂志卷二，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3] 马自树：《中国文物定级图典·一级品·下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图053号。

（二）划时代戳形抑埴工具的扛鼎之作

伴随万年仙人洞遗址抑埴图纹印记陶片的发现，从原始制陶工艺角度分析，抑埴图纹印记的戳模应伴随制陶的发明而同时出现，只不过是原初单一的弥缝修整功用，渐变为专门抑埴图案、印记或标识、凭证符号的工具。这类抑埴工具的出现，于印学研究有着划时代意义。

1. 河南舞阳贾湖“十”字陶戳

贾湖文化遗址“十”字陶戳印的发现，在受到考古界青睐的同时，更被印学界视为溯源的实证而竞相考证、引用与转载。

作为淮河上游支流沙河与洪河流域的史前聚落遗存，贾湖遗址是新石器时代前期遗址，其年代在公元前7000—公元前5800年间，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初，1983年至2001年间曾进行过7次发掘。其大量遗存的出土，把中国文字、音乐、酿造以及稻作农业史等上溯到了8000年前。发现的陶片种类有泥质陶、夹碳陶、夹砂陶、夹蚌陶和夹云母滑石陶等，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陶器的所有类型。考古学家俞伟超评价说：

贾湖遗址的发掘，可称是80年代以来我国新石器考古中最重要的工作……，对我国新石器早期遗存来说得到了迄今为止最丰富的资料。^[1]

20世纪80年代，其前期遗址（二期、三期文化为公元前6600—公元前5800年）曾出土一枚“十”字阴文陶质戳形抑埴工具，编号为“贾湖T108（3B）：2陶坠”（图15）^[2]，徐畅先生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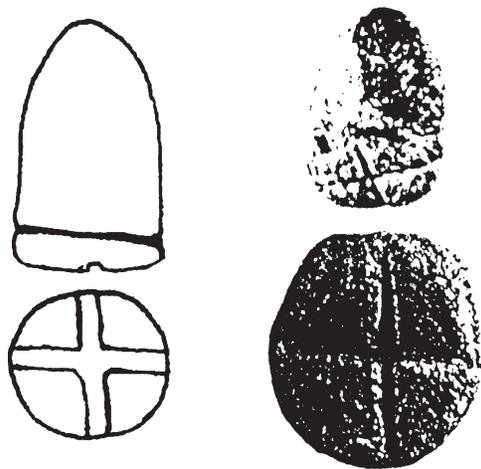


图15 贾湖“十”字陶（戳）印

[1] 张居中：《舞阳贾湖》（上下卷），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俞伟超序。

[2] 张居中：《八千年前的书法艺术——河南贾湖原始文字的发现与研究》，《中国书法》2001年第1期，第32—34页。

此陶器钮部无穿孔，不能穿绳，如何能坠？故此陶器应为陶印模，专用于陶器泥胎的按压之用，功用与陈玺斋所藏的“十”字形印迹极为相似。^[1]

同时认为陈介祺所藏陶器“⊕”形抑埴图纹“印迹（图16）^[2]为陶印模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从实物看，虽有“陶网坠”所具备的系绳凹槽，但我更趋同于徐畅先生的观点。无论“十”字的文字学意义抑或带有宗教意味与否，也无须揣测凭信功用的有无，仅就其形制看，其抑埴功能显而易见，不容置疑。可以说：贾湖“十”字戳形抑埴工具是中国玺印起源于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前期的第一实物。

2. 河南澠池郑窑陶戳

图纹、印记的抑埴现象，在中原地区出现使用年代较早，实物资料多有出土。河南澠池城西的郑窑遗址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1985年郑窑第三期文化遗存（相当二里头三期）出土的陶质戳形器（图17）^[3]，孙慰祖先生确为“当是用于抑印陶器之类的戳记”^[4]，古文字学家王蕴智先生认为“此戳形器似具有徽识的性质”^[5]。两者观点都有抑埴功用之识。



图16 陈介祺所藏陶器“⊕”形印拓



图17 三面有刻划符号的郑窑陶戳

据¹⁴C年代数据显示，“认为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被限制在公元前1900—公元前1500年的范围内”^[6]，缘于对该戳形器时代多持有大致相当于夏王朝中后期的观点，故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700年较为适当。

该陶质戳形抑埴工具，长5.5厘米、宽2.3厘米、高20.0厘米，系泥质红褐陶，烧结温度较高；

[1] 徐畅：《安阳殷墟出土铜印——兼谈玺印的起源》，《篆刻》杂志二卷，第30页；徐畅：《先秦玺印图说》，第1—2页。

[2] 转录于徐畅：《先秦玺印图说》，第2页，图1—3。

[3] 张居中、王良启：《澠池县郑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第91页，又图四一·6，图二九。

[4] 孙慰祖：《西周玺印的发现与玺印起源》，《孙慰祖论印文稿》，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

[5] 参阅王蕴智《河南应该从文字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一文。

[6] 仇士华、蔡莲珍、洗自强、薄官成：《有关所谓“夏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年第10期。

器呈方柱形，三面所刻符纹均为阴文，正面（2.3厘米×20.0厘米）通联刻划“田”字纹，两侧面（分别为5.5厘米×20.0厘米）图形意义不明；其两端截面（2.3厘米×5.5厘米）各有圆形窝状凹陷，凹陷周围刻弧线或直线。

从器形看，陶戳形器为长扁方柱体，棱角不分明，高20厘米，粗5.5厘米×2.3厘米，……两端的凹陷圆窝理应是用以压抑的纹饰。压印于陶胚后，印迹则成凸起之乳钉，作为陶器装饰之用。^[1]

这种器型两端截面凹陷用于抑埴乳钉、同圆纹与三面阴刻为边款的论断，虽具理性，然从整体器型看，似与西亚两河流域滚印有相同之处。是否可以三面滚动抑埴图纹、印记，我们不得而知，但类似郑窑陶戳的这类图纹印记，在稍晚的江西清江吴城三期文化层所出的陶器中有三例，皆属于抑埴而成，颇具徽识性质^[2]。

“中国在秦始皇以前一千年已有印章，至周代，用玺已颇普遍。”^[3]据考古发现，自西周中晚期至东周，黄河流域等地的陶器已颇盛行抑埴图纹印记之风，大有替代刻划之趋。大量资料显示，像这类圆点、圆圈乃至更为复杂的图纹，无论单独抑或连续抑埴，都能在史前至殷商时期陶器上找到相应的表现。可以说，郑窑与贾湖遗址陶质抑埴工具的发现，足以表明中原地区是中华玺印的发祥地之一。

3. 湖北长阳清江香炉石遗址的两枚陶印

该遗址位于湖北长阳县渔峡口镇，年代最早为距今4000余年。自1983年发现到1995年三次发掘，在获得“三代”大量文化遗物的同时，还发现了商周时期的甲骨和两枚商末周初的陶印。

两陶印（图18）^[4]出土于香炉石遗址第四层，其年代为商末周初（公元前1100年前）时期。其中：一枚印体灰黄，残长4.5厘米；印面圆形，阴刻，径1.9厘米；另一枚印体灰色，残长5厘米；印面椭圆，阴刻，其长轴2.1厘米，短轴1.2厘米（图19）^[5]。巴人早期历史，在公元前2000—公元前1000年新石器时代末至西周时期。“香炉石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有巴文化的明显特征，其时间也正好与我国早期巴人的活动时间相吻合。”^[6]中科院考古所陈公柔先生认为，两印出于早期巴文化遗址西周时期地层中，应系巴人较早之印。有专家以文字学分析认为，两印文为“蔡”与“鲛”，“蔡”与甲骨文接近，“鲛”可能与有巨口利齿的水生动物相关；然历史考古学家张政烺先生则认为，两印章应是巴人早期遗物，与汉字无关。

[1] 徐畅：《先秦玺印图说》，第3页。

[2] 王蕴智：《远古陶器符号摹记·清江吴城遗址陶器符号》，《书法报》1994年第29期；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第四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1—13页。

[3] 凌纯声：《印文陶的花纹及文字与印刷术发明》，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之三，1963（2），第144—145页。

[4] 王善才：《香炉石——我国早期巴文化遗址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图十九。

[5] 徐畅：《先秦玺印图说》，第3页，插图一。

[6] 王善才：《香炉石遗址的早期甲骨和陶印章》，中国文物报1994年12月18日第三版。



图18 两枚刻有图形的长阳陶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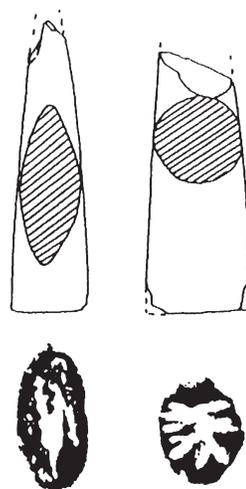


图19 两枚刻有图形的长阳陶印线描立体图及印拓

窃以为：抛开文字学角度，无论其功用该如何释读，就形制看，无异于早期刻划图纹、印记与符号的一种抑埴工具。像此类陶质戳模抑埴工具，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时期遗址中多有发现与出土。

从仙人洞遗存的图纹印记陶片并结合制陶所需抑埴工具的形制分析，抑埴工具的出现应与其年代大致相同。然而在长期的考古发现中，一直没有见到比贾湖陶戳更早的抑埴实物，就现有资料看，年代大都晚于公元前6000年。除地层的深度与存留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外，其遗址发现的地理位置和发掘量，也是后来出土与否的重要原因所在。

三、抑埴图纹印记研究于印学之意用

抑埴行为从萌发到转化为陶作抑埴技术，是人类智力行为的进步。从将抑埴工具有意缠藤绕草成绳，抑埴于陶坯留存图纹印记，渐变到图纹模印抑埴技术运用，不仅仅在于解决陶作复杂问题的能力，更在于先民们寻求利益最大化的活动方向。抑埴图纹印记的发现运用，使原始的陶作产生了迈进，在提高产能效率的同时也增进了器物美感。这种陶作的工艺程序，迄今在世界很多民族地区土陶作坊中依然沿用，从中不难窥及古代制陶抑埴工具的演变历程。除陶拍、戳模抑埴实物工具的出土外，带有抑埴图纹印记的史前陶器、陶片的大量出现，为进一步深入探究玺印生发与嬗变增添了有力实证。

陶作虽不像冶铜炼铁因制作生产工具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里程碑，即便是在新石器时代也只作为附属和替代作用的工具和材料。但是，陶器的发明作为人类迈向文明的肇端，它促使和稳定了人类的定居生活，同时也推进了农业生产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发展历程。

陶作技艺作为先民思想、情感外化表现的一种手段，抑埴行为留下的图纹、印记则体现了他们的原始诉求与向往。这些颇具生活化的原生态符号，虽然是先民们二元朴素辩证意识的一种自然流露，实质上却蕴涵了大量的民族审美意识的独特基因信息。作为原始陶器的遗存，尤其是所存留的抑埴图纹印记，虽然不是文字，但它们毕竟是远去年代所留下的带有抑埴痕迹的实物，在体现风格

形式多样的同时，更多地承载着悠久历史内涵和广泛的文化外延，是反映史前人类生存侧面的活化石，其所蕴含的古史信息弥足珍贵。

陶器虽易碎难存，但其陶作技艺中不断更新变化的图纹印记、形制等工艺特征的遗存，给我们对年代的梳理、排序提供了原始的翔实信息。通过比较学原理，我们从其图纹印记种类与形制的组合中，不但可以区分其考古学文化类型以及纵横关系，而且可以探究其所反映的社会制度、生活状况与文化形态对玺印生发、演变的影响。有鉴于此，对史前陶器抑埴图纹印记的挖掘、梳理，于印学渊源流变的探究有着重要意义。

如果说陶作乃玺印生发之母，那么，陶器抑埴图纹印记的行为便促使了玺印的生发。我们试图从抑埴陶器图纹印记的角度，去发现中国玺印更早的历史，但事实上，考古发现的比较、对照更能说明问题。如前所述，贾湖遗址所出公元前6000年的“十”字陶戳、骨笛以及占卜用具，实证了中国在文字、玺印、音律、数学、酿造以及稻作农业等领域的起源要早于西亚两河流域等各类文明两千余年。鉴于抑埴图纹印记陶片的发现，故说仙人洞与吊桶环两处史前人类洞穴遗存陶片的抑埴图纹印记，可称之为“玺印之源”的抑埴实物之祖，而贾湖“十”字陶戳的出现或可称之为“世界印章之祖”的最早实物。

综上所述，原始陶器图纹印记抑埴行为现象的出现，对玺印的发生而言，其意义在于：

其一，原始图纹印记的抑埴工具，虽然简约单一，但从其抑埴行为与现象分析，它是玺印的原始雏形；

其二，图纹模印抑埴技艺的出现，在使陶器图纹抑埴技术向前迈进的同时，也缩短了玺印演化形成的距离；

其三，无论图纹印记的直接抑埴或间接复制，都离不开抑埴行为，其记载、传播信息的功能及其抑埴行为技术的完善与成熟，必将给后来玺印的出现以启示与动力；

其四，原始陶器图纹印记抑埴行为现象的出现，直接导致了玺印生发。

从上述不难看出，无论从工艺技术角度还是从原理和设想考虑，说新石器时期图纹印记的抑埴行为为玺印源头，都符合历史的事实。

四、结语

就一般意义而言，“制陶完全可能由不同地区的原始先民各自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发现、发明，而不一定需要其他地方人群的传授与教导。”^[1]这已是考古界公认不争的事实。同样，通过大量的考古学调查统计资料显示：玺印的出现并非某一地区、部族的专属，当一个集群部落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都能以各自独立的方式发明、创造出来；它是人类长期生产、生活实践的必然结果，并且在其生发演进过程中，能够依照自身需求而加以吸收、融合、改进和完善。正如刘启良先生所说：

[1] 冯先铭：《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并演化为传统，在文化传播中，既可以排斥外域文化，又有能力将外域文化吸收过来为自己所同化，从而确保自己的个性和存在价值。^[1]

随着地域文化遗址的不断发掘与研究，原始陶器抑埴图纹印记的发现为中华玺印自身起源说提供了有力实证；在证明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同时，也证实了它是源于本土自身连续发展起来的；与此同时，也驳证了近年中国玺印源自两河流域这一学说的不确定性。这对于探讨世界玺印文化起源的“多元”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如若认可远古陶器图纹印记的抑埴现象为玺印萌发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江西仙人洞等遗址的抑埴图纹印记陶片足以证明原始抑埴工具起源于中石器时代以前的早期人类活动时期。故此，我们有理由说，中华玺印的历史毫无疑义可随之上溯到同期年代。这种源于人类本能行为的抑埴现象的出现，远比两河流域等其他地区陶作的出现要早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只不过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目前尚未发现同时期的抑埴实物而已。

参考文献：

- 刘钊等：《新甲骨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徐文镜：《古籀汇编》，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
- 《辞源》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
- 李学勤：《试说传出殷墟的田字格玺》，《中国书法》2001年第12期。
- 《全国首届“篆刻学”暨篆刻发展战略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书画报社、西泠印社1997年版。
- 叶伟夫：《中国印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林惠祥：《福建省长汀县河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1957年第1期。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刘诗中：《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发掘获重要进展》，《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28日，第4期。
- 吴小红、张弛、保罗·格德伯格、大卫·科恩、潘岩、蒂娜·阿平、欧弗·巴尔-约瑟夫：《江西仙人洞遗址两万年前陶器的年代研究》，《南方文物》2012年第3期。
- Xiaohong Wu, Chi Zhang, Paul Goldberg, David Cohen, Yan Pan, Trina Arpin, Ofer Bar-Yosef (2012). Early Pottery at 20, 000 Years Ago in Xianrendong Cave, China. Science, 336, 1696—1700.
- 杨雪、朱文新：《万年仙人洞出土最古老陶器入选2012年全球十大考古发现》，《上饶之窗》2012年12月24日。
- 陈艳伟：《世界最早陶器出自万年仙人洞》，《江南都市报》2012年7月27日。
-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考古》1976年第3期。
-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等：《桂林甑皮岩》，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1] 启良：《东方文明畅想录》，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 陈向进、周海：《甗皮岩首期陶双料混炼工艺及陶雏器初探》，《江苏陶瓷》2016年第2期。
-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碳十四实验室等：《石灰岩地区碳14样品年代的可靠性与甗皮岩等遗址的年代问题》，《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 胡大鹏、漆招进、韦军：《广西桂林甗皮岩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陶器》，《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等：《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75年第5期。
- 李淀：《南宁顶蛳山贝丘遗址》，《中国文化遗产》2008年第5期。
- 赵宾福：《兴隆洼文化的类型、分期与聚落结构研究》，《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1期。
- 吕昕娱：《兴隆洼文化陶器初论》，《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科版）》2007年第2期。
- 张龙：《广西南宁市豹子头贝丘遗址的发掘报告》，《考古》2003年第10期。
- 柳州市博物馆等：《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83年第9期。
- 华东文物工作队：《四年来华东区的文物工作及其重要的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8期。
- 蒋缙初：《杭州老和山遗址1953年第一次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
- 仲星明：《中国古代印刷图形探源》，南京艺术学院学位论文，分类号：Y0301031，2006年5月。
- 胡悦谦：《安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 谢春祝：《徐州高皇庙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
- 徐畅：《先秦玺印图说》，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
- 徐畅：《安阳殷墟出土铜印——兼谈玺印的起源》，《篆刻》杂志卷二，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
- 马自树：《中国文物定级图典·一级品·下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
- 张居中：《舞阳贾湖》（上下卷），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 张居中：《八千年前的书法艺术——河南贾湖原始文字的发现与研究》，《中国书法》2001年第1期。
- 张居中、王良启：《浞池县郑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
- 孙慰祖：《西周玺印的发现与玺印起源》，《孙慰祖论印文稿》，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
- 王蕴智：《河南应该从文字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
- 王蕴智：《远古陶器符号摹记·清江吴城遗址陶器符号》，《书法报》1994年第29期。
- 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
- 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第四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 仇士华等：《有关所谓“夏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年第10期。
- 凌纯声：《印文陶的花纹及文字与印刷术发明》，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之三，1963（2）。
- 王善才：《香炉石——我国早期巴文化遗址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 王善才：《香炉石遗址的早期甲骨和陶印章》，中国文物报1994年12月18日。
- 冯先铭：《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 启良：《东方文明畅想录》，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

图版说明:

图1 商代田格四字“刊旬抑直”玺。采自《中国书法》2001年第12期,封二。

图2 李学勤释“刊旬抑直”玺文。采自《中国书法》2001年第12期,第8页。

图3 带有抑埴凹点印纹的夹粗砂厚胎陶罐残片。采自杨雪、朱文新:《上饶之窗》2012年12月24日。

图4 带有抑埴印纹的夹粗砂厚胎陶罐残片。采自陈艳伟:《江南都市报》2012年7月27日。

图5 甑皮岩首期陶“陶雏器”残片。采自陈向进、周海:《江苏陶瓷》2016年第2期,第2页,图1。

图6 甑皮岩遗址带绳拍印痕纹的陶片拓片。采自胡大鹏、漆招进、韦军:《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第213—225页,图2:1—5。

图7 甑皮岩遗址编织纹(1—4)、几何纹印痕的陶片(5—8)拓片。采自胡大鹏、漆招进、韦军:《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第213—225页,图3:1—8。

图8 几何纹“乌石炭陶印”。采自林惠祥:《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1957年第1期,图71—75。

图9 蘑菇式与方形托泥板式陶拍。采自蒋缙初:《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第13页,图版肆5、6,图版贰15。

图10 原始编织物苇席残片(约1平方米)。采自仲星明:《中国古代印刷图形探源》,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33页。

图11 几何、叶脉纹的两件陶印模。采自林惠祥:《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1957年第1期,图版一,10;图版三,5、7,第27页。

图12 高皇庙遗址陶拍。采自谢春祝:《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第12页,图版陆4—7。

图13 秦兵马俑跪射俑右侧履底。采自秦兵马俑博物馆二号坑。

图14 拍面刻有过墙雷纹与握梁鼻钮人形纹相连的椭圆形陶拍。采自马自树:《中国文物定级图典·一级品·下卷》,第44页,图053号。

图15 贾湖“十”字陶(戳)印。采自张居中:《中国书法》2001年第1期,第32—34页。

图16 陈介祺所藏陶器“⊕”形印拓。转引自徐畅:《先秦玺印图说》,第2页,图1—3。

图17 三面有刻划符号的郑窑陶戳。依据张居中、王良启:《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第91页,图二九,又图四一·6,按比例制作。

图18 两枚刻有图形的长阳陶印。采自王善才:《香炉石——我国早期巴文化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图十九。

图19 两枚刻有图形的长阳陶印线描立体图及印拓。徐畅:《先秦玺印图说》,插图一:陶印玺印文拓片。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沧海印社副秘书长兼印学理论研究室主任)